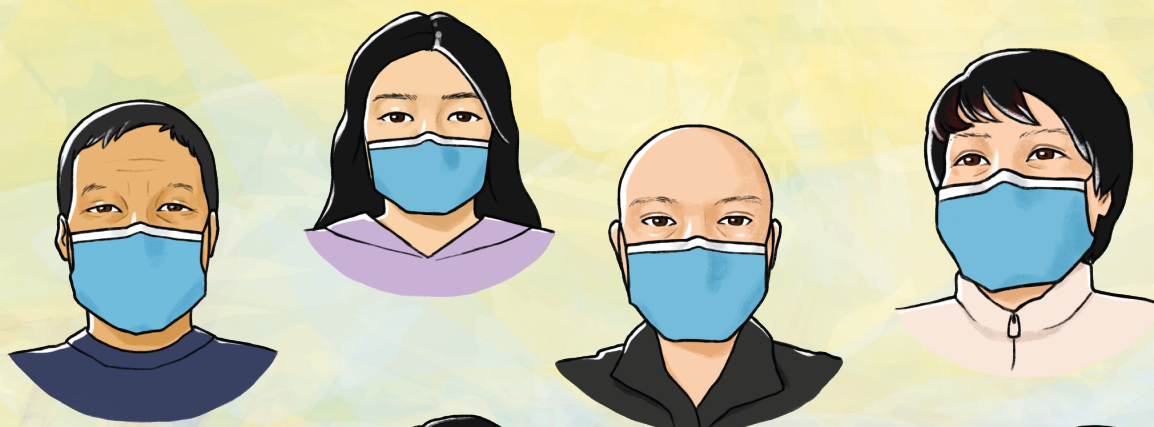


我们的生命是不可或缺的

《新冠病毒期间, 华裔前线工人 处境报告》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Toronto Chapter
全加华人平权会多伦多分会

致敬

平权会多伦多分会向所有前线工人、家属及朋友致上最高敬意。我们听见您的声音，关心您并且支持您。

平权会也向和我们分享故事与经验的每一位前线工人，致上无限的感激与敬意，感谢您宝贵的时间。

同时，平权会也向所有的工人、会员、义工表达谢意，感谢您无私的奉献时间与精力，于新冠疫情期间，同我们一起努力支援前线工人。我们感谢您的智慧、想法和时间。本报告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工人们慷慨地分享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并得到了参与本报告创作的人们的大力。

我们感谢Atkinson基金会在创建本报告和整个项目中的支持。

2021年5月27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坎卢普斯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发现215名儿童的遗体。2021年6月24日：在萨斯喀彻温省的Marieval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发现了751个无标记的坟墓。2021年6月30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圣尤金传教学校发现182个无名墓。这些发现提醒人们，加拿大与原住民社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黑暗关系。作为加拿大的有色族裔定居者的一员，我们必须抵制各种形式的殖民暴力。

我们恭敬地认为，大多伦多地区的华裔加拿大社区成员和前线工人在 Dish with One Spoon Wampum Belt Covenant 的原住民土地上生活、工作和组织社区力量，该土地是信用第一民族密西沙加，Anishinaabe、Haudenosaunee 和 Huron-Wendat的传统领土。我们希望履行我们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以及我们支持Turtle Island上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的权利和主权的承诺。

2021年9月出版

作者: Jessie Tang and michelle liu
资料分析: Jessie Tang and michelle liu
编辑: Rain Chan, Kennes Lin, Celia Huang, Kelly Lui, Philbert Lui, Tony Hu, Nikki Huang, Matthew Pi, and Cassandra Ma
艺术创作—Worker Portraits: Xue Xu @yumigou_

报告翻译: Chuck Yachun Li, Michelle Lin, Dong Yao and Anna Long
工人故事翻译: Zichen Xu, Jessie Tang, Nikki Huang, Chuck Yachun Li, Tony Hu, michelle liu, Connie Lam and Chris Zhang

“家里经济状况再难我都会想办法，我希望两个小孩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好，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

—Ms.A
(餐厅员工)

目录

致敬	1
目录	3
来自执行董事和董事会联席主席的一封信	4
执行摘要	5
研究的主要发现	5
报告建议的摘要	6
□□	8
研究方法	9
社区领导的问卷调查	10
社区带领的故事访谈	10
接受采访的前线工人的人口概况	12
发现	15
建议	26
结论	29
前线工人故事	30
Ms. A (餐厅员工)	31
Jasmine (住家护工)	32
Ms. X (清洁工)	34
Ah-De & Da-Zi (超市员工)	35
Xie & S (超市员工)	37
Copy (建筑合约工)	39
Michael (超市员工)	41
Biyang (餐厅员工)	42
Yuan Feng (外卖行业)	43
Anna (受伤工人)	45
David (个人护工)	48

来自执行董事和董事会联席主席的一封信

对全国各地的许多社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华人社区面临着对抗新冠病毒疫情和种族主义病毒同时肆无忌惮的弥漫。在2020年农历新年伊始，平权会会见了多伦多市的官员，就全国范围内不断上升的反亚裔种族主义事件商讨策略。不久之后，平权会在下议院卫生事务常设委员会上发言，谈及加拿大应该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对在加各地的排华和种族主义影响。2020年至2021年，平权会参加了50多家媒体采访去影响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在多伦多参与共同组织和领导了超过5000人参加的集会的直接行动，并制作了2020年全国报告《被种族主义攻击的一年：贯穿加拿大的反亚裔行为》。

我们必须把最近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反亚裔种族主义的经历与加拿大长期的体制性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包括中国人头税、排华法案、驹形丸事件和日本拘留营事件。新冠疫情引入了“重要”工作的概念，它将部分前线工人视为英雄，而其他前线重要工人却被忽视了。在这场疫情中，许多加拿大华人在杂货店、餐馆、按摩店、性产业和卫生部门工作时，首当其冲地面临体制性和人际关系间的种族主义。

同时，平权会收到了针对新冠疫情的紧急资金，在疫情期间用来支持脆弱的华裔加拿大工人。在50多名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向数百名华裔一线工人提供了食品盒和个人防护用品。为了确保工人们得到支持，并获得有关公共卫生措施和收入支持的最新信息，我们走访了社区和工人们的工作场所，与工人建立起一对一的联系。通过在与社区的无数次交谈，工作人员、工人和志愿者们感到有必要记录加拿大华裔一线工人的处境和声音。超过50名志愿者、成员和多代工作人员共同参与领导、设计、调查活动，并且采访了295名工人，了解他们在疫情期间未满足的需求和要求。在此，我们在这份报告中介绍了这些由社区主导的研究结果和建议，揭示了加拿大华人一线工人每天面临的危险和不稳定性，以及他们对保护工人阶级家庭的更好和更公平的政策的要求。

我们必须成为前线工人的支持的坚强后盾，这里的前线工人涵盖所有的工人。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只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表现方面。我们与黑人、原住民、穆斯林和其他有色人种社区团结合作，为集体解放而不懈奋斗。这是我们对努力实现社会和经济上公正的19年后复苏时努力保持的承诺。

真诚的。

Jessie Tang

Jessie Tang
联合执行董事

Lin Kennes

Kennes Lin, MSW, RSW
董事会联席主席

执行摘要

2021年1月至3月，平权会多伦多分会（CCNCTO）开展了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社区研究项目，以反映大多伦多地区加拿大华人移民人口中的工人阶层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经历。该研究包括一项由295名工人和社区成员完成的调查，涉及多个工作部门，以及一个由社区领袖的故事分享和采访项目，让青年志愿者与其他工人和社区成员进行代际交流。该研究的重点是收集定性数据，以评估社区问题和可能进行改革的领域。

参与研究的工人大多数从事低薪高风险工作，往往工作场所有着健康安全隐患。受访的工人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业（在长期护理中心、居家、和医院工作的个人护理员和护士）、零售业（超市前线工人）、餐厅、制造业（工厂工人）和建筑装修业。调查显示工薪阶级加拿大华裔和移民社区，在疫情期间，面临低薪、高风险、和高压的工作环境。此报告反映，前线工人要求更进步、强健的政策，确保政府投入更多资源、保障给工人。

这项研究的数据揭示了新冠疫情期间前线工人的以下方面。

研究的主要发现

1. 前线工人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长时间工作，薪资低。
2. 大多数前线工人觉得工作场所不安全。
3. 绝大多数的前线工人时常感受到自身无力改变生活及工作现状。
4. 前线工人经常面临高压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健康问题。
5. 工人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进步的政策，来更好地保护工薪阶级的家庭和社区。

报告建议的摘要

1. 拓展对所有工人的就业保障，特别是针对在不稳定的就业条件下必要行业人员、低收入工人和收入不稳定的工人。除了保障生活的薪资，工人们值得拥有安全、公平和有尊严的工作环境。

- a) 提高法定的基本薪资至每小时\$20加币，以更接近安省的基本生活薪资
- b) 确保所有工人都可获得有保障和永久的带薪病假：10天的永久带薪病假和在紧急期间，14天的带薪病假
- c) 确保所有工人都能享有就业保障和收入援助，无论其就业类别如何。
- d) 通过修订安大略省2000年《就业标准法》，使之包括在《加拿大劳工法》规定的终止不正当解雇的保护措施，从而赋予工人权力。
- e) 确保强有力地执行劳动法，以保护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时经常面临各种障碍的就业条件不稳定的工人。

2. 作为新冠病毒公平复苏计画的一部分，提供所有工人，永久免费、无障碍的心理健康服务。此服务需相应不同的社区文化以及语言。

- a) 提供免费、无障碍、紧急照护、永久的心理健康服务。此服务需相应不同社区的文化、语言，且针对有色族裔、边缘化的工薪阶级社区。
- b) 注入资金于社区里的教育和资源，于华裔社区内，去污名化心理疾病。

3. 投入资源在加拿大华裔工薪阶级的社区，帮助他们有能力改善自身遭受到的不平等工作待遇。

- a) 资助免费、无障碍以及持续性的移工、工人权利训练项目、工作坊、教育资源、新举措，以增强工薪阶级社区的力量。
- b) 保障工人组工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对抗来自雇主、房东、移民局和机构的歧视和剥削
- c) 支持工人的代表权、领导权和参与权，通过多样化的方式直接塑造其工作场所的条件，包括：加入工会、委员会成员和公民参与。

4. 人人有身分!

- a) 对于所有没有身分的移工、国际学生、工人以及社区成员等，制定立即以及全面的项目，帮助他们在抵达加国后，立即有身分，以及提供移民身分正规化的项目
- b) 立即终止所有驱逐和移民拘留
- c) 终止针对移工、有色族裔的相关法律限制及行动，并在所有的政府单位，实施不查移民身分的政策。
- e) 给所有的工人普及收入支持性的项目，不论他们是否有移民的身份。

“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打到疫苗，那疫苗就沒什麼用了。如果打疫苗要冒著被驅逐或逮捕的危險，那這些人就不會冒險去打疫苗。保護每個人，也是保護加拿大的一種方法。移民和難民從世界各地來到加拿大。這些人中不僅僅有華人。他們也都需要被照料。”

—Anna
(受伤工人)

简介

66

一周六天上班，謝大哥每日除了十二個小時工作，另外花上四個多小時通勤。

99

Mr. Xie—超市员工 (故事请看第33页)

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加拿大华裔工人阶级身居前线工作的重要位置。根据多个社区研究指出，疫情使经济、健康的不平等更加恶化，而此不平等的现象在加拿大已存在了三十年之久。¹不公平的健康风险、语言障碍、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和不稳定的移民身分皆加深了弱势族群的困境。“谁是必要的？”和“谁的生命比较重要？”的问题，透露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各种不平等的生命经历。“必要工作”经常被描述成“英雄性的”，但讽刺的是，这些工人其实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现实条件迫使他们只能把自身和家人的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工人需要一个立即、可行性的方案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本研究报告着重于加拿大华裔工薪阶级的前线工人，纪录他们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自身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分享，并讨论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改进，以确保给予社区必要支持。我们聚焦在疫情如何影响华裔移民前线工人。

平权会透过社区研究、外展、故事访谈以及支持前线的工作，我们得出重要的结论，显示华裔工薪阶级的需求是清楚、急迫的。为了确保公平复苏，我们需要确保加拿大华裔工人阶级的社区，能拥有各种资源和支持来保障他们的需求。其中，包含了永久的10天的带薪病假，享有能应付生活需求的基本工资，授予永久居民身分，拥有便利且免费的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的服务。



图:平权会会员出席多伦多停止反亚裔仇恨游行 (2021年3月)

此项报告可让各级政府、市议员、政策制定者、社会服务和社区团体了解华裔移民工薪阶级社区的生命经验，以落实更进步、保护工人的政策。

1. Barakat, Grace. (2021) One Year Later: Unmasking COVID-19. www.issuu.com/islamicreliefcanada/docs/irc_report_unmasking_covid-19-update-v2?fr=sZjhmNTI1NzZmMDg

这项报告应与平权会的新冠病毒反亚裔歧视报告一起阅读

这份纪录前线华裔移民工人的报告，为平权会2020年出版的新冠病毒反亚裔歧视报告:加拿大反亚裔歧视的一年的延伸。平权会最新的报告，反映了体系中的不平等，显示有色族裔移民工人更有可能在疫情间做为前线工人。² 我们建议可将两份报告一起阅读，进而掌握更全面的了解。新冠病毒反亚裔歧视报告指出，许多种族歧视攻击特别发生在餐厅和超市，此工作场所也是许多加拿大华裔前线员工的上班所在地，依据 covidracism.ca (一个种族歧视、攻击报告的网站) 收集到的资料，这些攻击事件的发生地点占了约五分之一，且获报的攻击案件持续进行中。

身处弱势族群的加拿大华裔前线工人，在几十年以来受到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政策影响。而这些系统性问题，反映了边境暴力、殖民-定居政治经济下的排除以及劳动榨取。

由这些加拿大华裔前线工人的经验，可反映出社会结构性的反亚裔种族歧视，并作为更广的种族歧视中的一环。模范少数族裔是白人至上主义下，控制工人的工具之一，导致不同族裔工人之间的分裂，并使华裔以及亚裔工人，噤声并且压迫他们不去争取权利。

2.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2020). "A Year of Racist Attacks: Anti-Asian Racism Across Canada One Year into the Covid-19 Pandemic." www.covidracism.ca



社区主导的方法概

本报告立基于平权会多伦多分会支持前线工人项目所获得的经验，并对前线工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进行了初步描述。过去一年来，我们与超过五十名义工、会员和工人一起做外展、与前线工人发展支援关系。我们透过他们的工作场所、小区以及社区网络，与他们建立关系。有些前线工人没有稳定的移民身份。而对于那些有移民身分的工人，仍因为种族、阶级以及性别压迫，而被边缘化。

大多数的前线工人为低收入、受雇于低薪工作，并有语言障碍。许多前线工人在长期护理中心、医院、家庭或是社区中，担任个人护理员或是护士。当中有许多受雇于中介公司。也有许多在超市、餐厅、建筑装修、工厂、健康护理、幼教、家庭工人、社区、零售还有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人。



图: 平权会外展员发送照护包裹给超市前线工人

社区领导的问卷调查

作为我们外展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进行以社区领导的问卷调查，来理解大多伦多地区内华裔工薪阶级社区的现况。社区主导的方法以工人的声音、生活经验和他们在塑造叙述和政策方向方面的领导力为中心。2021年1月到3月期间，我们共收集到来自前线工人与社区成员的295份问卷。此问卷由平权会多伦多分会的员工和会员、前线工人一起设计。透过会议、咨询以及意见回馈的方式，我们与社区一同设计了41个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针对前线工人的工作经验、薪资、家庭生活以及对于政府措施的意见，以及他们对于政策的期许。我们透过平权会会员网络、支持前线项目联系的工人，发送问卷调查。除了网路问卷填写外，也顾虑到部分受访者，因没有便利的网路可使用，以及对电子产品的不熟悉性，平权会也提供纸本问卷，目的在于更广泛接触更多的受访者，提供更全面的意见反馈。

本次调查的295份回收问卷里，其中204份由前线工人所填写。问卷回答中，女性占135位，男性占65位，剩下的4位不愿表明性别。填写问卷的前线工人之中，医疗照护产业的工人占百分之40，零售业（超市居多）占百分之16，餐饮业工人占百分之21，剩下的百分之9为制造业和建筑、装修的工人。

社区带领的故事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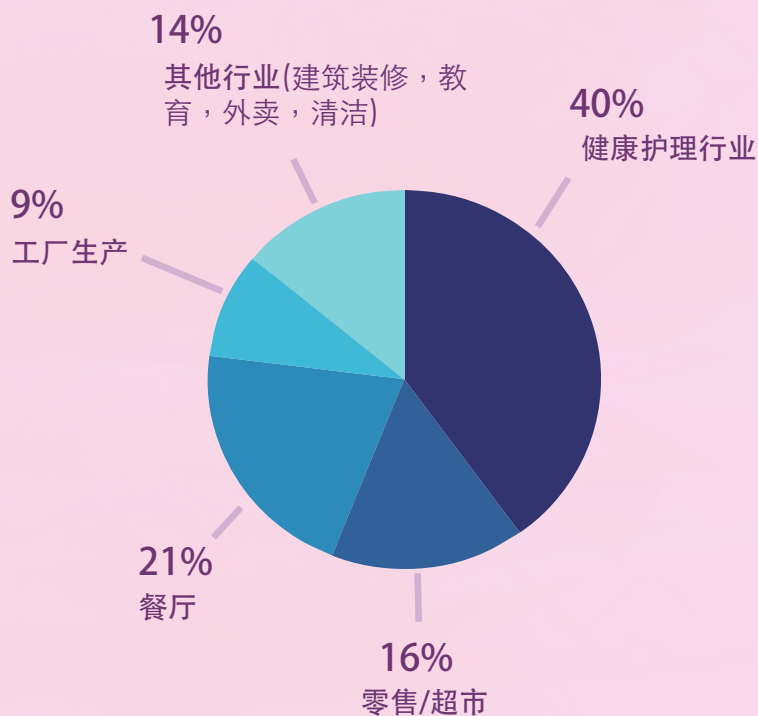
前线工人以及平权会青年成员一起合作的故事访谈，对于我们的报告也非常的重要。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我们和许多工人们已建立互信的良好关系。其中几位工人的故事包含在此报告中。透过前线员工叙说自身故事的访谈方式，读者也能够从工人身上了解生命经验的面貌。利用这样叙述的方式，不仅能显示交叉性、以及多元性面貌，也让我们更理解不同的议题如何影响前线工人。

故事访谈的工作、内容以及形式由平权会的青年成员带领。他们也为平权会支持前线工人项目的重要义工。故事访谈计画在两个多月中，透过聊天、访问、倾听的方式，收集撰写相关采访资料编译于此报告里。

透过青年成员和前线员工建立起的信赖关系，我们共采访了13位工人，取得11个宝贵故事，加深跨世代的交流。在13位接受采访的人工里，1位是送货工人，4位是超市员工，1位是家庭工人，1位清洁工，2位是餐厅员工，1位是餐厅老板，1位是个人护理人员，1位是装修建筑工人，剩下的1位是受伤工人。在这些经验分享里，呈现出加拿大华裔移民的收活百态以及韧性，并反映出移民身份、性别、年龄、社经地位状态等因素，是如何影响到他们面临的工作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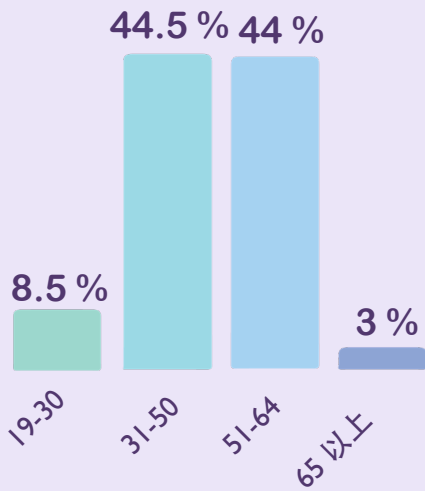
295社区成员 填写问卷， 其中204人为 前线工人。

不同行业的前线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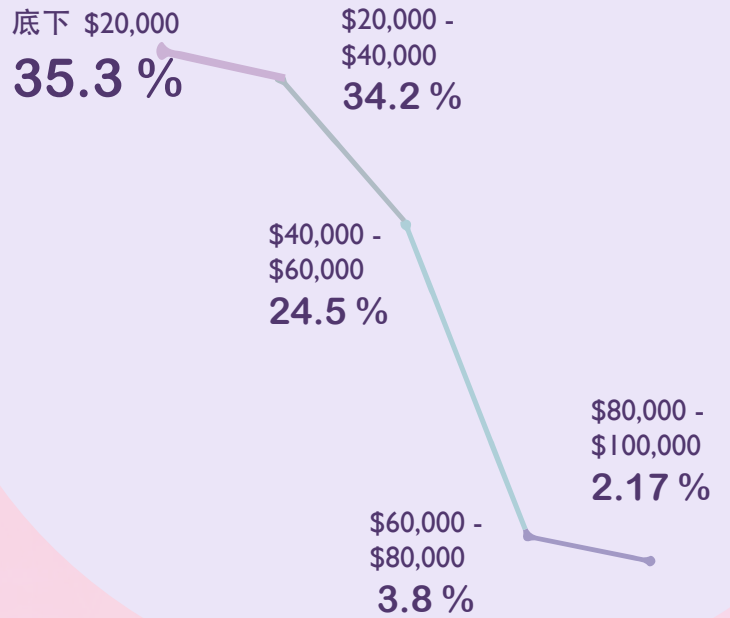


接受采访的前线工人的 人口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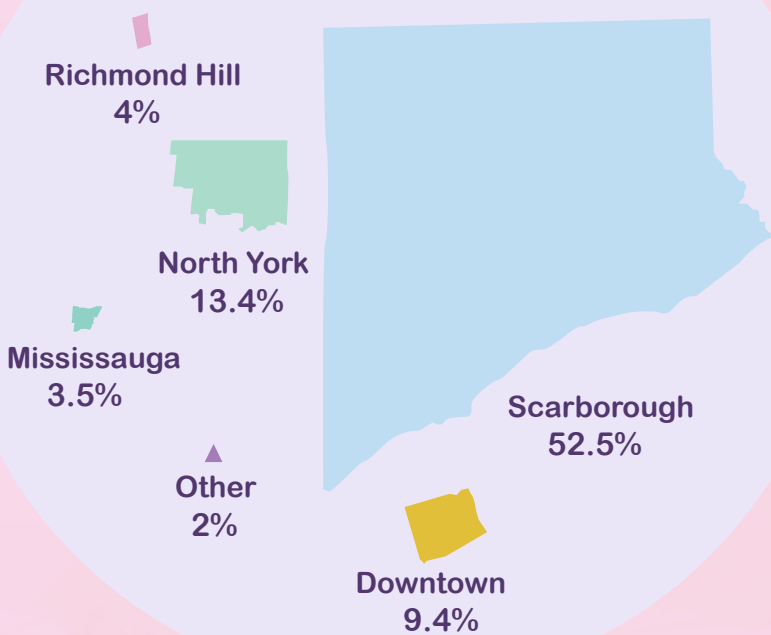
年龄



年度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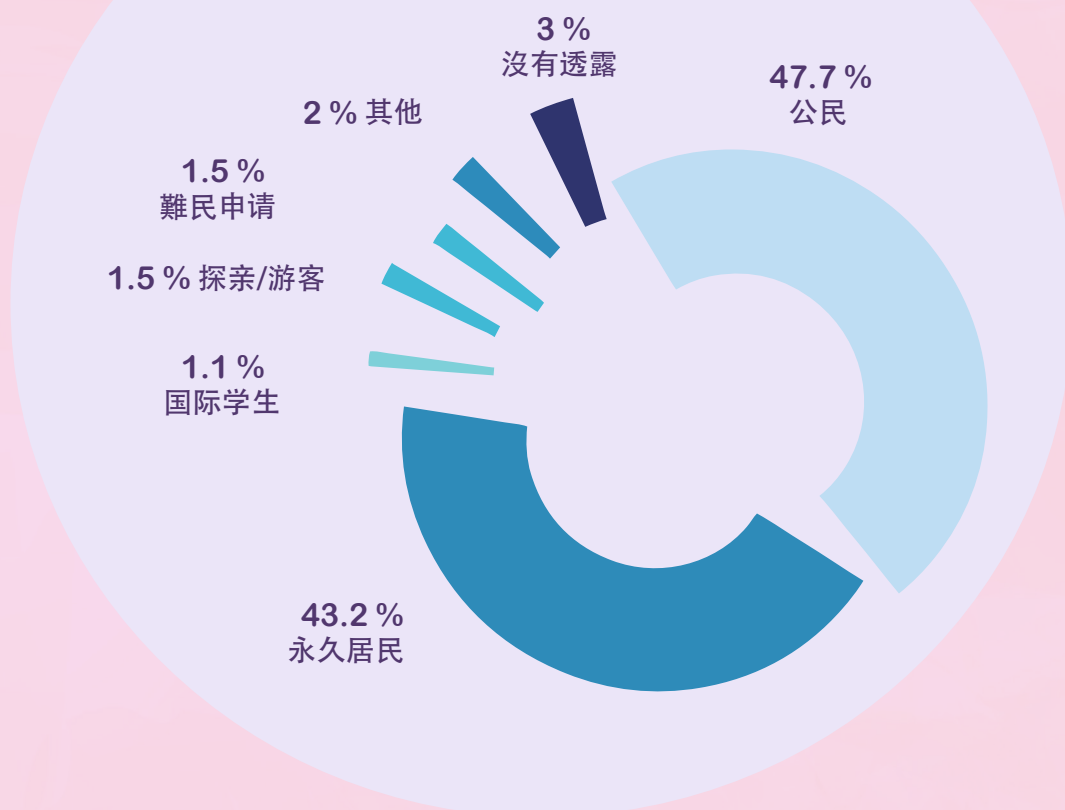


邻里社区



调查中所显示的
的被调查工人的
占比...

移民身份



报告局限

我们认识到本报告有局限性。首先，本报告是由社区主导的，并不是正式的科学系统调查的产物，所以调查结果不具有普遍性。本报告的目的是以华裔工人的生活经验为中心的，并且相信社区在引导和塑造叙事方面的力量，从而可以建立长期的社区凝聚力。基于相信社区的知识和能力，本报告接触到了通常在大多数学术和政策研究中被忽视了的许多被边缘化的工人。第二，本报告可以通过收集更多的人口数据信息和客观测量来加强报告的价值。具体来说，包括基本的人口统计资料，比如加上小时工资、工作时间、病假资格和新冠疫情期间的工资变化，会更有参考价值。更多的客观信息可以帮助更好地证实我们在本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工人生活经历的主观发现。同样，其他人口统计信息，如移民身份、在加拿大和原籍国的居住时间，可以帮助了解有身份和无身份的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这些限制主要是来源于担心破坏我们组织与边缘化社区的关系。随着我们与社区建立更多的信任，并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确保所收集的数据可以属于社区和被社区利用，我们将努力在将来呈现一个更全面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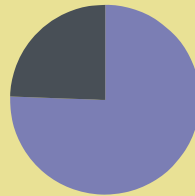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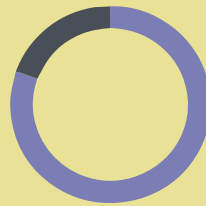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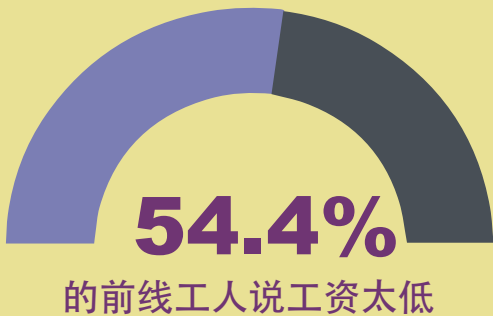
“疫情对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疫情之前，我和很多兼职的同事们都会到不同的养老院工作，来保证自己有全职的收入，因为很多养老院只提供兼职的岗位。疫情之后，我们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养老院工作，这对于我们来说很残酷。就那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每个星期就只能工作两天。从收入方面来说，就减少很多。”

— David
(个人护工)

发现

1.

加拿大华裔前线工人工时长、薪资低、工作环境危险



对很多加拿大华裔和移民来说，早在新冠疫情之前，低薪工作就已是严重的问题。这使得工人们更容易面临持续增加的健康及经济风险。记录显示有色族裔工人过多地从事低薪资且危险的工作。

事不安全和危险的工作。这些工作不成比例地增加了他们暴露于新冠病毒，及其他健康风险的机会。

在大多数加拿大华裔前线工人从事的行业中（如：超市、零售、医疗健康、餐饮、制造和家庭工人）疫情加剧了工人们一直以来面临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包括偷窃工资、低薪资、工时长、工作环境危险、雇佣条例不稳定、缺少集体的谈判能力以及极少获得劳动保护和收入保障。低薪意味着工人必须长时间工作、做更多轮班以及同时从事更多份工作。他们更有可能需要长距离通勤、乘坐公共交通，以及从事需要面对客人、与公众近距离接触的工作。这类工作环境也通常较为拥挤、容易爆发新冠疫情。低薪也使得工人在为自己发声的时候，面临更大的被报复和反击的风险。在这个经济系统中，低薪工人更易被迫从

69.4%
的前线工人没有
工会代表

3.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2021). "COVID-19: It's time to Protect Frontline Workers." *The Monitor*. www.monitormag.ca/index.php?p=articles/covid-19-its-time-to-protect-frontline-workers

58%的前线工人反映，疫情期间感受到经济压力。低薪是压力的主要成因之一。令人担忧的数据包含大多数前线工人（54.4%）表示说他们获得的薪资太低。完成调查的63.3%的餐饮从业人员、57.3%的医疗健康从业人员、58.5%的零售（超市）工人和26.3%的制造业工人认为他们的薪资不足。此外，安省的强制性针对新冠疫情加薪只适用于某些基本工人。独立护理人员、餐厅工作人员、生产工人和零售/杂货店工人在被贴上“基本工人”的标签的同时被排除在强制性加薪之外。80.4%的前线工人表示疫情期间没有收到加薪。缺少加薪在餐饮业前线工人中尤其显著，他们当中有95%表示疫情期间没有收到任何薪酬。

更糟糕的是，完成调查的大部分的前线工人（75.6%）表示，在疫情期间，他们的收入受到了某种形式上的损失。2个工人中就有超过1人（56.8%）的正常收入减少了1-50%。很多工人（18.8%）反映收入减少了50%-100%。

尽管是否有工会似乎不是在疫情期间，决定各行各业低薪前线工人的经历的重要因素，我们注意到很大一部分（69.4%）的前线工人没有工会集体谈判力量。所有前线工人中，医疗健康工人参与工会的占比例最多，在全体30.6%有工会代表的工人中，他们占了67.9%。只有16.7%的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0%的零售（超市）员工参与工会。

很多前线工人感到低薪工作很有压力。超市工人占据了其中很大一部分。56%表示他们有经济压力，50%说他们有心理压力。10名超市员工中有近1名回应说“是”被迫工作。

每5人中就有1人表示自己过度工作。78%的超市和零售工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

超市工人的统计



超过一半的超市工人经历经济、心理的



每5个超市工人中，就有1位表示过劳

0%的超市工人有工会代表

66

对于Michael来说，许多工作上的问题不是在疫情之后才出现的。超市这一行工作，待遇低、工时长，是疫情以前就存在长久的问题。没有劳工法保障的工资，例如最低工资、假期钱...等等。移民之前，我以为在美国和加拿大，很容易就可以赚很多钱，Micheal说，但是来这里以后，移民的生活似乎只是讨口饭吃。

Michael— 超市工人(故事请看第37页)

99

2.

每两个中，
就有一位工人
认为工作
场不安全

66

由于雇主没有提供防疫用品，她和其他同事都要自己准备N95口罩、护目镜、手套。其中部分是一次性用品，消耗很大，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她对于工作安全也很担忧，因此精神压力也比较大。

Jasmine—住家护
(工故事请看第28页)

99

加拿大华裔前线工人的工作场所是不安全

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工作场所的安全对很多工人来说，就是一个顾虑。工作事故、工伤和长期对健康的影响对很多加拿大华裔前线工人来说，都是每天要面对的问题。低工作流动性和其他障碍，使得有色移民前线工人和身分不稳定的人，更容易处在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之中。此时，他们能获得的资源和选择都寥寥无几。在疫情期间，2个前线工人中就有1个表示他觉得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安全。3人中有1人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器具。41.46%在长期护理中心、医院和其他私人护理机构工作的医疗健康从业人员表示，他们缺少充足的个人防护器具。

与男性相比，无法改进不安全和糟糕的工作环境，对女性的影响更大。在接受调查的前线工人中，58%女性感觉她们的工作环境不安全。与之相比，30.8%的男性工人有此种感觉。在餐饮、医疗健康、服务和制造业，前线工人大部分是女性。在这些行业，工人们更容易感觉工作不安全，并且更少有加薪机会。

我们的研究发现女性占制造工人中的68%。58%的前线制造工人对不安全的工作场所表示担忧。根据我们的调查，制造工人中，三人中有四人（75%）没有收到疫情期间的加薪。50%的零售及超市员工、51.2%的医疗健康从业人员和45.5%的餐饮从业人员也感觉工作不安全。

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位工人
表示缺乏个人防护器具

依据性别，工人对于工作场所的安全

在餐饮业、健康护理行业、服务以及工厂生产领域中，前线工人多为女性。在这些领域中，工人们更感觉到工作场所不安全，更少机率有薪。

58%

的自我认同女性的工人觉得工作场所不安全

30.8%

的自我认同女性的工人觉得工作场所不安全

今年一月，Anna和她丈夫同时在密西沙加的一个肉类加工厂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的二儿子都在那里工作。他们五口之家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他们最大的儿子，本来是餐厅管理人，疫情中是在家工作的摄像师和编辑；以及在工厂工作的小儿子。Anna的丈夫是第一个出现症状的人，恢复期间他在家呆了三个星期。同时工厂也关了门，以控制疫情。Anna去年三月已经停止工作，此时她的症状比丈夫更加严重。四个月之后，她仍遭受着病毒造成的衰弱和延长的后遗症。例如上楼梯时呼吸困难、肺部乏力和紧张。

Anna—受伤工人 (工故事请看第42页)

目前在华人超市工作一年多了，疫情期间每天上班，心情压力很大。这样心理的恐慌在没有健康卡的状况下更是加剧。谢大哥说每当有人在公共场合靠近、咳嗽时，他心里就会特别的紧张。而他作为一名杂货部门的员工，常常会遇到客人询问商品的位置。不会英文、但是工作认真的他，会用起手机翻译，和顾客沟通。这样近距离接触的工作方式，让他在疫情期间感到非常不安。

Mr. Xie—超市员工 (工故事请看第33页)

来自制造业领域的统计



58%

在制造业的前线工人表达对于工作场所不安全的忧虑

68%

在制造业的前线工人为女性

3/4

的制造业工人在疫情期间没有收到加薪

3.

非常多的加拿大华裔 前线工人感觉无力 改变现状



的前线工人感到无力改
进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每4个华裔前线女性工人中，
将近3位感到没有任何力量
改进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66

工头时常会用侮辱性的词汇辱骂下属，并用开除来威胁装修小工们...那些装修工头特别傲慢，再苦再难的活，钱再少，只要他们一句话，就要去做，要不然他们就骂人，或者威胁换人。为了生活，不想干也得干。有工作总比没有强。

99

Copy—建筑合约工 (故事请看第35页)

“你觉得你有能力改变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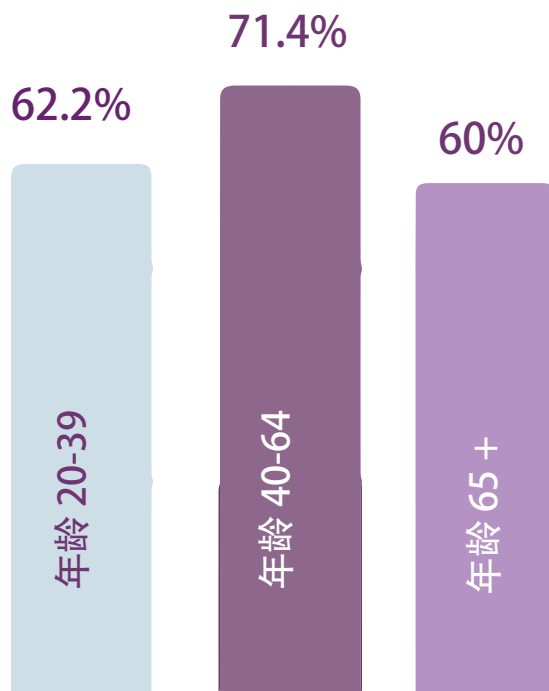
当被问到是否感觉自己有能力改进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大部分工人的回应是否定的。在1至5的范围内，1表示没有能力，5表示有能力，其中70%的前线工人选择1或2，表示他们感觉没有能力改进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74.4%的女性前线工人觉得她们没有能力改进不安全的工作环境。58.72%的男性感觉他们不能改变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工作的不安全感也随着年龄上升，但在每个年龄组都明显存在。20至39岁的工人中，37%的工人感觉工作不安全，是所有年纪组中占比最低的。40至64岁的工人中，这个比重增加到多过一半，达到51.7%。在65岁及以上的工人中，66.7%表示他们感到工作不安全。

在三个年龄组中，感到无力改变工作状况的工人所占比重相当地高，达到60%至71.4%。65岁及以上的工人中，有60%感到无力改变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无论工人是否参加工会，对于普遍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似乎不会改变工人们对于无力改善工作环境的感觉。这或许反映了工会力量的被侵蚀，以及政府于疫情期间临时的政策凌驾于集体合约之上。这也可能是由于69.4%的前线工人没有加入工会。

工人感到无力改变不安全工作环境
(按年龄区分)



66

我问阿德他对大姊被无故辞工甚么想法? 他说在多伦多, 人生地不熟的, 也只能让一让。有一份工作就好, 能忍就忍。如果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他一定会问老板哪里没做好, 怎么改进。

99

Ah-De & Da-Zi—超市员工
(故事请看第31页)

4.

加拿大华裔前线工人遭受着压力及负面的心理健康影响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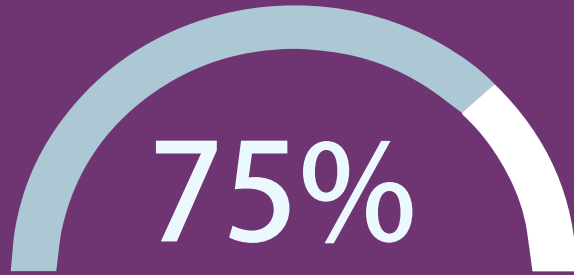
对于A女士而言，疫情前的工作与生活便谈不上轻松。而突如其来，如洪水般肆虐的疫情，更使得A女士的生活举步维艰。在生活方面，A女士有一儿一女。在疫情爆发前，儿子刚刚从航空专业毕业。尔后便遇上了疫情，找不到工作，提交了简历却只能苦苦等待，至今没有收到回复。而女儿也因为疫情与A女士关系激化、争吵，患上了抑郁症，需要使用一种三月底刚推出的新药。每每想到这里，A女士就感到十分难过，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Ms. A— 餐厅员工
(故事请看第27页)

99

61.3%

的前线工人
觉得工作
压力太大



超过75%的健康护理人员表示压力过大

61.3%的前线工人表示他们压力太大。在所有受访的工人中，在医疗健康业（大部分是长期照顾中心、医院和私人机构的个人看护、护士和护工）工作的工人受的影响最大，超过75%的医疗健康从业人员表示，疫情期间工作压力太大。制造业工人和零售（超市）员工也是受疫情期间的压力影响最大的人群。有57.9%的制造业工人和55%的零售业员工说他们感到压力过大。

除了零售业，其他行业的工人大部分是有色族裔的女性。两性间不平等的压力程度，反映了不成比例有色族裔女性工人暴露在危险、低薪和有压力的工作环境中。66.7%的性别认同为女性的前线工作人员，表示经受太多压力。53.8%的性别认同为男性的前线工人表示他们有太多压力。性别认同为女性的工人，除了带薪的工作之外，也往往会有照顾家庭的责任。

压力和焦虑另一个主要的来源，是对几代人同居的住户中，对于孱弱的老人和家人的焦虑和担忧。这种焦虑，经常伴随着学龄孩童学校中的令人困惑和不停改变的政策。特别是学校重开的政策调整，以及学生缺乏在家学习的支援。

54%

的前线工人 担忧来

在加入工会的工人和没入工会的工人之间，压力程度也有所不同。占其中大多数（78.3%）有工会代表的工人表示压力太大。这或许反映大部分有工会代表的工人大多集中在医疗健康业，也反映了疫情期间，医疗健康业工作人员，危险、直接和有创伤性的工作性质。与之相比，虽然比例惊人地高，55.1%非工会工人表示感到太大压力。在40岁至65岁年龄组中，68%的工人压力过大。这是三个年龄组中比例最高的。20岁至40岁年龄组中，45%的工人感到压力太大。65岁及以上的工人感到压力的比例最小，占到33%。

另一个疫情期间的前线工作造成的重大影响，是工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能力。54%参加调查的工人告诉我们，他们对未来担忧。疫情期间过长时间承受压力，和高风险工作带来的焦虑对工人们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担忧的。对各个产业的工人来说，强健的心理健康服务是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对受工作压力影响最大的前线工人来说。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性因素，如收入支援、工作稳定、住房、工作场所安全，对华裔前线工人的心理健康来说，也有着重大影响。

66

在大流行病发生之前和期间，她都通过为女儿买菜和做饭来照顾她。然而，由于她女儿的疾病和她自己没有身份，气氛很紧张。她曾与警察有过紧密接触，并与房东有过负面经历。在大流行病期间，她的恐惧被加倍放大了。她生活在感染COVID-19和被房东驱逐的恐惧中。

99

Ms. X—清洁工 (故事请看第30页)

5.

工人们在表达他们的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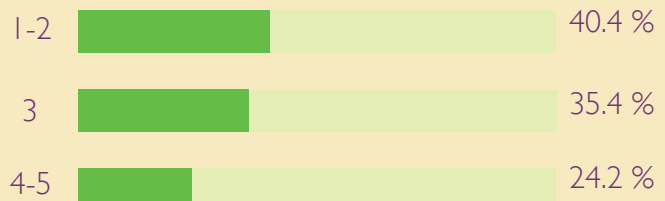
我们询问了工人们24个有关加拿大的政治和政策变化的问题，来更好地了解，他们认为与他们的生活关系最大的是什么。在此收集的前线工人的回复，更好地反映了华裔加拿大前线工人社区的现实和渴望。工人们通过社区调查所表现出来的，是他们需要进行有意义的政策和立法改革，使工人阶级的家庭能够平等地获得体面的工资和安全工作的机会。例如增加法定的最低薪资、永久性的全民带薪病假、所有边缘人群都有更好的工作、减少工薪阶级的征税、全民基本收入、更负担的经济住房、人人有身分、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支援低收入购房者的住房保障。

前线工人支持政策改进比例

73%
的前线工人
强烈表示政府
需要更有效地
减少前线工人
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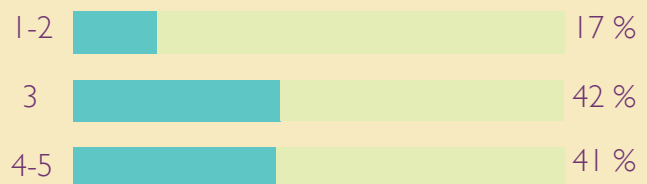
前线工人对于疫情政府措施

(1分最不满意, 5分最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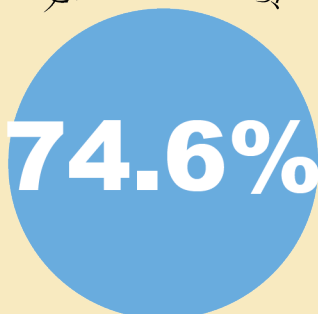
前线工人对于政府疫情收入保障施

(1分最不满意, 5分最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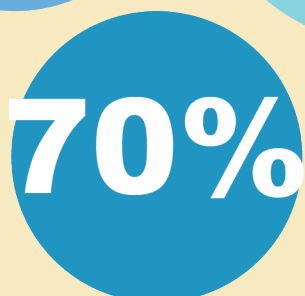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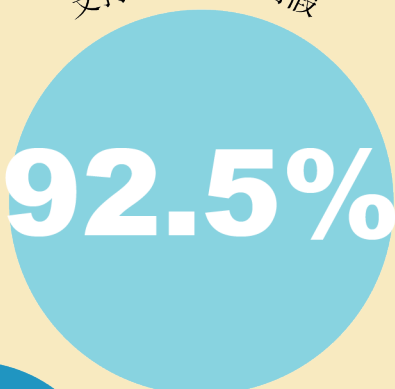


劳工法律

支持提高最低薪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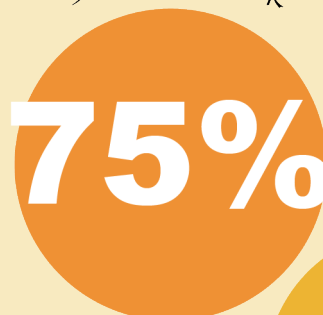
支持全民带薪病假



支持所有边缘人群
都有更良好的工作机会

住房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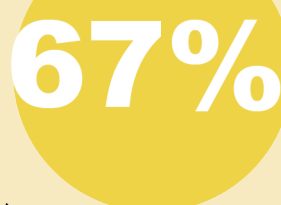
支持购房者政策



支持可负担的住房

税收改革、收入支持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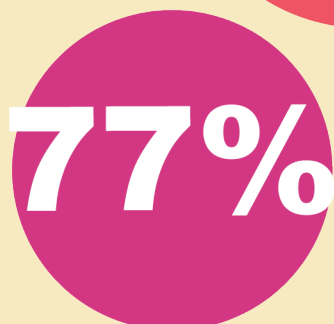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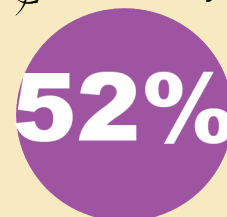
支持工薪阶级公平税制



支持更多基础设施投资

移民政策

支持人人有身分



支持基本收入



支持提高富人税率

“她每天坐三辆公交车去上班，然后再坐三辆公交车回家。虽然她记不清楚自己每天的工资是多少，但她估计自己的工资是每小时10美元，低于法定最低资。”

—Ms. X
(清洁工)

建议

加拿大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强调必要行业从业人员极其重要，因此他们无法在家工作、保障自身安全。讽刺的是，前线工人却被认为是容易被取代，但也有人提出，他们太过临时和短暂了，因此无法有工作的保障，以及无法拥有能够支付基本生活的工资。公平的疫情复苏过程要求每个人都能健康、有尊严且安稳地生活，包括前线工人。这项由前线工人完成的社区调查显示了一些需要立即被关注的迫切需求。该项研究的结果为本报告中陈述的建议提供了基石。来自于加拿大华裔前线工人的呼声，要求更强有力和进步的政策，并反映社区中的担忧以及需要。工人们的真实经历作为具体事例展现了社会结构问题，诸如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低薪、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住房不稳定、以及在语言障碍、健康、教育和移民身份方面的差距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各级政府和社区团体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所有前线工人，尤其是那些遭受多重压迫和被边缘化的工人的健康、安全和尊严。以下是反映本报告结论的5项建议。

I) 拓展对工人的保护，从现在开始 — 工人们应享有在安全、公平和有尊严的工作条件的权力。

- a. 前线工人需要与足以支付基本生活开销相匹配的公平薪资——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20加币！低薪和收入不安全逼迫前线工人去做工时长、危险和不稳定的工作，同时，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安大略省目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4.25加币，远远不足以支付他们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基本生活开销。“安大略省生活薪资网”计算的目前在多伦多市的基本生活薪资是每小时22.08加币。强制在立法上做出改变，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20加币。基本生活薪资能满足工人的基本需求，并让他们能参与社区。
- b. 工人需要有保障和永久的带薪病假。安大略省新的3天带薪病假计划远远不够。确保所有工人都能享受法定带薪病假，工人们需要普遍和永久的10天带薪病假和在公共健康事件爆发期间，有14天的带薪病假。有充分证据表明，带薪病假可以保护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工人和社区。
- c. 将就业保护扩大到所有工人，无论其工种是什么。这对许多被边缘化和种族化的工人尤其重要，他们被错误地归类为独立的承包商，因此无法获得劳动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或充分获得收入支持计划提供的资金。

- d. 通过修订《就业标准法》，要求解雇工人需要有正当理由，使工人能保护自己免受不公正解雇。“正当理由解雇”条款有助于增加工作保障和对工人的保护，对那些无力改变恶劣工作条件的低收入及非工会会员的工人尤其有帮助。
- e. 确保劳动法的有力执行，以保护就业条件不稳定的工人，他们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时经常面临各种障碍。执行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如主动调查和对雇主进行处罚，是增加工人挑战不公平和不安全就业条件的力量的方法。

2) 作为新冠疫情复苏计划的一部分，为所有工人提供适合其文化与语言的永久免费且便利的心理健康服务。

- a. 为所有工人和有色族裔工人阶级社群提供免费、便利、长期和紧急情况下适合其文化和语言的心理健康支持。令人不安的是，大多数前线工人报告称他们经历了太多因疫情相关的工作情况引发的心理压力。为前线工人及因为疫情而失业或无法工作的社区成员提供心理健康保健需被优先考虑。现有的心理健康保健服务系统为那些寻求帮助者，包括获得基于个人偏好的语言的文化敏感的照顾的障碍；在社区获得免费项目的障碍。
- b. 注入资金于社区教育和资源，在加拿大华裔和亚裔社区内，提倡去污名化的心理健康服务。通过提供收入保障和资助相关社会、同侪资源来支持工人的心理健康。

3) 向加拿大华裔工人阶级社区投入资源，以提高工人改善不公正不公平劳动条件的能力。

- a. “各级政府持续提供资金以支持社区组织并且提供免费和可参与的“移民和工人权利”培训项目、讲习班，教育资源和倡议，重点是赋予工人阶级社区权力。
- b. 保护工人成立工会、组织和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以战胜伤害他们的雇主、房东、移民官员和机构。
- c. 支持工人的代表、领导及参与，直接改善自身工作环境。这包括在就业场所的工会、组织、理事会和委员会决策过程中优先考虑工人的力量。工会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确保将有色族裔和被边缘化的工人放于中心地位。

4) 人人有身份!

- a. 在所有移民、工人和身份不稳定的社区成员抵达加国后，立即给予他们永久居民身分，以及提供移民身分不稳定的工人，有移民身分正规化的项目。不稳定的移民身份将工人置于更少选择机会和更无力改变不公正及糟糕工作条件的处境。现有移民系统在工人们已经面临的困境之上又增加了一层由国家和工作场所带来的暴力。
- b. 立即终止所有驱逐出境和移民拘留。驱逐出境和移民居留作为一种国家机制，迫使工人保持沉默，拆散工人阶级和移民社区，并弃工人于危险和不稳定的居住和工作条件中于不顾。
- c. 终止一切针对移民者和有色族裔工人的不公平法律限制和行动。移民和有色族裔工人每天都在为我们的社会正常运转做出贡献。任何工人都应该成为执法部门的针对目标，也不该受制于使他们处于风险中、有种族歧视的法律。必须支持工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保证他们不必担惊受怕地、安全地获得各级政府提供的服务。

结论

加拿大华裔移民前线工人、工人阶级社区成员和低收入社区成员每天都在不稳定、低薪和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被当成隐形和随时可丢弃的物件一样对待。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前线工人所经历的健康和经济的不利影响折射了社会体系中种族主义的残忍。“反亚裔”种族主义袭击往往与公开的暴力行为相关，但社会结构本身的种族主义事件也存在着，包含由移民系统、劳力剥削、收入无保障、语言排斥，以及拒绝给予其安全保护和永久居留身份所引发种族歧视。

由于篇幅有限，本报告未能提供横跨所有行业工人经历的陈述。然后，我们和所有工人们站在一起，包括我们社区的性工作者。加拿大华裔工人的挣扎和希望是真实存在和极为重要的。必须实施更多能带来实际改变的政策，以改善全体加拿大华裔和其他被边缘化的工人的幸福安康，保障他们的生活。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加拿大华裔工人和社区成员。

前线工人的
故事：
加拿大华裔工人
访谈录

A女士的故事

Zichen Xu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 yumigou_

Ms.A 是在餐馆工作的前线工人

疫情爆发前，A女士曾在工厂工作，工厂的工作十分辛苦。A女士说到：“我那时候用铁钳做车门，做到手疼，开车的时候手都直颤的那种麻疼，为了手疼，我需要吃药，看医生，只能放弃在工厂的工作，去了一家餐馆工作”

在第一家餐馆，A女士往往需要连续工作八到九个小时，中间只有15分钟的用餐时间。结束工作后，A女士每天都会感到酸痛难耐，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后经朋友介绍，凭着自己吃苦耐劳、善于学习的品质、和之前在ESL学到的英语，A女士因能够处理外送平台的工作，才在2019年来到了现在的餐厅工作。

对于A女士而言，疫情前的工作与生活便谈不上轻松。而突如其来，如洪水般肆虐的疫情，更使得A女士的生活举步维艰。在生活方面，A女士有一儿一女。在疫情爆发前，儿子刚刚从航空专业毕业。尔後便遇上了疫情，找不到工作，

提交了简历却只能苦苦等待，至今没有收到回复。而女儿也因为疫情与A女士关系激化、争吵，患上了抑郁症，需要使用一种三月底刚推出的新药。每每想到这里，A女士就感到十分难过，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家里经济状况再难我都会想办法，我希望两个孩子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好，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

而对于工作上，A女士因为认真工作，明明只是正常和顾客沟通，却总是被恶意找茬的顾客认为态度不佳，举报A女士，并称“那个老婆子态度不好，赶紧换掉”。面对顾客的恶意举报，老板的排挤和全家经济压力的重担，A女士只能坚强的继续努力，用自己扎实的工作能力，维持着自己的家庭。面对着种种的不公，A女士说：

“我从来不要那些小心思，勾心斗角的，我只想把事情做好，活干好，凭自己的一分本事挣一分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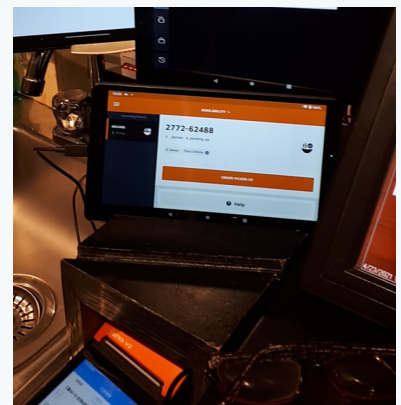


图：餐馆里有许多平板作为外卖服务操作。（摄像者：Ms.A）

对于疫情方面，A女士对加拿大的防疫措施感到十分没有信心。她表示疫情刚爆发时，还对政府的防疫措施与疫情的走向有一定的信心，但随着病例数的一步步上涨，她对加拿大的疫情感到十分恐惧。她每天都会用盐水漱口，并服用中药，希望能降低自己感染疫情的可能性。

而问起A女士对政府防疫的建议时，A女士提到，在她的家乡广东，乃至整个中国，疫情都已经基本消退，人们可以正常生活，正常上街并外出。A女士希望政府能够适当采取中国的防疫措施，以缓解加拿大肆虐的疫情。

同时A女士希望政府能够关注疫情期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能够创造一些工作岗位，以供像她儿子一样的年轻人能够参加工作，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



图：餐馆窗户的照片。餐馆在许多外卖平台上提供服务。（摄像者：Ms.A）

Jasmine的故事

Chuck Yachun Li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 yumigou_

Jasmine 是家政前线工人。

受到平权会的邀请，前线工人Jasmine与我们分享了她疫情期间的工作、生活，以及以前的工作经历。

Jasmine现在从事的是家政工作，已经五年多。疫情期间，因为没有私家车，Jasmine每次上班都要乘坐公车。因为不知道同车的人是否有积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有过怎样的出行经历以及是否曾经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下，所以她每次乘坐公车都提心吊胆，怕被直接或间接传染到。此外，由于雇主没有提供防疫用品，她和其他同事都要自己准备N95口罩、护目镜、手套。其中部分是一次性用品，消耗很大，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她对于工作安全也很担忧，因此精神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因为本身信佛，有信仰的支持，所以相信可以渡过此次难关。

聊起疫情对家庭和生活的影 响，Jasmine提到，疫情期间，父亲住在长者大厦。因为疫情的影响，自己不能经常去看望父亲，父亲也无

法像以前一样经常出门进行休闲活动，或者与其他长者聊天，会感到寂寞，也因此变得脾气有些暴躁。不知道这样下去还有多久，只希望疫情尽快结束，可以回复正常生活。

对于政府的防疫措施，总体来说，Jasmine是比较满意的，比如对于因雇主的过失而没有报税的人，也有最低保障。只是希望政府和社区可以提供足够的防疫用品，减少劳动者的经济负担。此外，疫情期间公共场所经常反反复复戒严又解禁，让人有点无所适从，因此希望政府有更完善的抗疫规划和机制。关于雇主，疫情期间已经提供了合理的工资，因此她没有更多的要求。

说起以前的工作经历，Jasmine表示，在做家政工作之前，自己在餐厅工作了二十年左右。入行时还年轻，加上没有什么技能，英文水平也不高，餐厅的工作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当时时薪大概\$10左右，没有报税，没有EI, CCP. 工作期间受伤过很多次。在餐厅比较忙的时间段，需要跑动。有时甚至忙到都没有时间更换经期卫生用品，因此不得不用很大的卫生棉，以减少更换的次数。尽管这样，使用卫生间时还必须通知领班，并且如厕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超过，则会被领班训斥。

Jasmine二十年前曾在当时多伦多最大的华人餐厅工作。当时的员工的待遇非常差。原本有一张员工专用餐桌，但是主管觉得让客人看见不好，就把员工赶到厨房里吃饭。老板看见，就觉得员工在偷懒，还会训斥员工。后来还威胁说要开除所有员工，于是领班要求员工躲进女卫生间吃饭。女卫生间里面堆了

很多杂物，吃饭时还要忍受卫生间的异味，环境很恶劣。但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而且当时大家既没有维权意识，也没有手机之类的先进设备可以记录下来作为证据，去向维权组织求助。除此之外，餐厅还经常根据需要而随意更改员工的小时数或临时取消当天的工作。但是大家都因为害怕失业而忍气吞声。

除此之外，在餐厅工作期间，Jasmine也听闻有女同事被上级性骚扰，更有女同事为了得到更多钟数而色诱上级。甚至有厨房主管乘职务之便，让女员工洗自己的衣服。性别歧视和剥削状况当时在餐饮业十分严重。

由于长期长期处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Jasmine双手发炎，两脚也受伤，最后终于决定放弃餐厅的工作，由朋友介绍转做家政工作。

家政工作的时薪几乎是以前家政工作的两倍，工作体验总体来说较

“此外，由于雇主没有提供防疫用品，她和其他同事都要自己准备N95口罩、护目镜、手套。其中部分是一次性用品，消耗很大，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前者好，但也还是比较辛苦。有时遇到不讲中文的雇主，沟通困难；有时遇到雇主要求做家务的同时照顾幼儿，两者无法兼顾；更有一次要照顾一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大小便、清洁、更换衣物尿布等都需要协助，昼夜作息也很不稳定，照顾起来十分吃力。

以前做住家保姆的时候，一天大概\$130-150，遇上好的雇主，可能还会提供餐点。如果要夜间照顾，另外再多\$100-200。现在精神体力做不了。晚上被吵醒，可能睡不着了。

纵观整个移民经历，Jasmine表示说，以前在广州做工厂，薪资不高。80年代兴起出国热的时候，自己也想出国闯一闯。当时资讯有限，觉得国外发展空间更好，就和家人一起移民过来。刚来多伦多时候，觉得街道很黑。环境很好。没有想象的热闹。但是也不后悔，因为政府好，人很好。现在就希望下一代不要过得和自己一样辛苦，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

66

女卫生间里面堆了很多杂物，吃饭时还要忍受卫生间的异味，环境很恶劣。但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而且当时大家既没有维权意识，也没有手机之类的先进设备可以记录下来作为证据，去向维权组织求助。

99

Ms. X的故事

Tony Hu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yumigou_

Ms. X 为前线清洁工人。

在四月一个寒冷的阴天，我在当地一所学校外面遇到了X女士。她是一位年长的中国妇女，穿着简单，戴着口罩和面罩。以下是她的故事。

作为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一线工人，她曾在一家工厂工作，制造调味的Vape产品。一线工人这个词将这项工作浪漫化，使其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有魅力。毕竟，“一线工人”和“基本工人”这两个词比“最低工资工人”和“牺牲工人”这两个词听起来更美好。

她每天坐三辆公交车去上班，然后再坐三辆公交车回家。虽然她不清楚自己每天的工资是多少，但她估计自己的工资是每小时10美元，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令这些挑战雪上加霜的是，她担心在通勤或工作中会感染COVID-19。

X女士分享说，她是一个无证移

民。虽然在加拿大没有合法身份所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人如何成为无证移民则要少得多。

X女士为了照顾她生病的女儿，在签证逾期后成为无证移民。在大流行病发生之前和期间，她都通过为女儿买菜和做饭来照顾她。

然而，由于她女儿的疾病和她自己没有身份，气氛很紧张。她曾与警察有过亲密接触，并与房东有过负面经历。在大流行病期间，她的恐惧被加倍放大了。她生活在感染COVID-19和被房东驱逐的恐惧中。

我对X女士的最初印象是，她不愿意为自己辩护。我意识到，这是她在社会服务和支持方面的不良经历造成的。2018年，她通过一个社会服务组织询问申请临时居留证，这将使她获得临时身份，并允许她在等待人道主义和同情性永久居留权申请时在加拿大和中国之间来回旅行。她记得，帮助她的工作人员匡小姐吓唬她说，她不应该申请，因为她目前是无证移民，加拿大移民局、难民局和公民局肯定会驱逐她。

直到今天，她仍然对这次经历感到不安，因为如果没有临时身份，她后来就失去了在中国陪伴重病母亲的机会。不幸的是，这种紧张的经历对于许多获得社会支持的边缘化人群来说是很常见的。

快进到今天，X女士描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经历，我甚至无法理解。

她的母亲回到中国后，患了脑血管疾病。X女士说，任何正直的人都应该照顾他们的父母。同时，离开去看她的母亲意味着她将离开她生病的女儿，在加拿大照顾自己。由于X女士没有身份，离开中国很可能意味着她将永远不会被允许回到加拿大看望她的女儿。在这两个选择中，选择一个意味着牺牲另一个，X女士含泪解释了她是如何决定留在加拿大照顾女儿的。

在大流行病期间，她的母亲去世了。X女士在几个月前成为永久居民。她最大的遗憾是听取了社会服务部门的建议，告诉她不要申请临时居留证，因此她没有机会照顾她的母亲。

“在大流行病期间，她的恐被加倍放大了。她生活在感染COVID-19和被房东驱逐的恐惧中”

阿德和大姊的故事

Jessie Tang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 yumigou_

阿德和大姊为前线超市工人。

阿德和大姊在2017年时，以探亲身分来到加拿大。他们的儿子、儿媳是双薪家庭，平时忙于上班，没有太多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因此阿德、大姊来到了多伦多，帮忙照顾孙儿。但没过多长时间，年轻人觉得老一辈带孩子的方式不一样，也不想阿德和大姊花在孙儿上了。

考量在多伦多生活昂贵，像是房价、地税、车子保险比起中国，都贵多了。因为身分的关系也无法领老人金，他们两个老人家决定出去打点工。

阿德和大姊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做街上清洁队，月收大概10,000人民币。而目前阿德工作四年多的超市，一周六天班，月收也大概2000加币。没身分加上年纪大，只能做清洁，工资都不高，一天10个小时也大多不到100块工资。虽然工资不高，但是他和大姊都觉得出去打点工，排解在异乡的不熟悉、无聊感，也是挺不错的。

我问他们比起中国，在多伦多哪里最不适应呀？阿德指了指路上，这里都没人呀！

在疫情期间，阿德工作的超市很缺人手，请大姊也来帮忙了。过了三个多月，疫情缓和下来后，超市经理突然开始挑剔大姊的工作，说她卫生做不好，直接请了另一个工人代替大姊的岗位。她觉得一个老人家，在疫情高峰时期，为超市贡献劳力。还有两个老人家做三个人分量的工作，怎么突然就被替换了，她觉得很不公平。大姊说自己脾气就是这样，遇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要说出来。被辞工的那天，她与经理争执，坚持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问阿德他对大姊被无故辞工甚么想法？他说在多伦多，人生地不熟的，也只能让一让。有一份工作就好，能忍就忍。如果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他一定会问老板哪里没做好，怎么改进，就事论事，按照规则做事。阿德说老板对他很满意，因为他做事认真、全

能，很多东西都会修理。

阿德说自己以前当兵，免疫力不错。对于疫情的担忧，在于店里有些顾客不戴口罩。他认为加拿大这里的管控不如中国，关了一阵子又开放，案例数当然会上升。中国管得严，小区和小区间都无法自由进出，大家的生活更快地回复正常。

前几个礼拜阿德下班回家，骑单车时被汽车撞，一整个人飞扑在地上。当下一个人也没有，驾驶肇事逃逸。后来儿子、救护车、警察都来了，幸好没有严重受伤。从这天起，大姊每天会走路二十分钟，到超市接阿德下班。

“没身分加上年纪大，只能做清洁，工资都不高，一天10个小时也大多不到100块工资”



图：阿德在家门外骑单车。

大姊说，两个人走在路上，汽车就不敢撞了逃跑。

他们平常在多伦多除了工作，感到很无聊，没有甚么事情做。阿德唯一休假的那天，早上醒来后，会躺在床上玩点手机，接着吃东西，过了会又想睡了。大姊说没工作时，他会在小区里，和两三个邻居走走路。

两个人都觉得在加拿大，老人家生活的真的很没意思。虽然在中国工作比较累，但是总觉得开心。以后还会来加拿大探亲，但因为年纪大了，生活很不方便，会缩短居住在加拿大的时间。未来还会继续回超市工作。他们觉得有个分会改变很多的不方便！阿德最后想和大家说，疫情期间，希望大家在外面做好防护措施。身体是自己的。

33

阿德最後想和大家說，疫情期間，希望大家在外面做好防護措施。身體是自己的

33



图: 阿德和大姊握着手，走路的背影照。

Xie与S的故事

Jessie Tang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yumigou_

谢大哥为在超市工作的 frontline 工人
S为餐馆小业主。

2015年来到加拿大后，谢大哥先后在华人餐馆、超市里工作。目前在华人超市工作一年多了，疫情期间每天上班，心情压力很大。这样心理的恐慌在没有健康卡的状况下更是加剧。谢大哥说每当有人在公共场合靠近、咳嗽时，他心里就会特别的紧张。而他做为一名杂货部门的员工，常常会遇到客人询问商品的位置。不会英文、但是工作认真的他，会用手机翻译，和顾客沟通。这样近距离接触的工作方式，让他在疫情期间感到非常不安。

除了惧怕疫情，疫情开始后反亚裔的事件，也让谢大哥焦虑。充满压力的生活，快要压垮了谢大哥。谢大哥在疫情间需要早上五点多起床，花上将近两小时的车程上班。下班回来也将近晚上十一点钟了。一周六天上班，谢大哥每日除了十二个小时工作，另外花上四个多小时通勤。

有时候心情不好，仅剩几小时的休息时间，谢大哥也睡不着。与他同住的亲戚，S说到，有时候谢大哥

会发脾气，老是说：“我快要倒下了，很累很累”，弄得大家都不开心。但是S也理解，在这样高压的生活下，加上没有身分，谢大哥当然觉得前路茫茫，孤孤单单。心里没有底，真的很困难。

将近六年多没有健康卡，谢大哥今年一月多透过社区的帮助，才成功地申请了健康保险。从前谢大哥身体不舒服时，只能买药、休息一会撑过去。”有病能藏，能过就过”。S说这几年来谢大哥昏倒过几次，但是没有健康保险，加上大家工作都忙碌，也没有特别的注意。直到今年谢大哥拿到健康卡，做了体检才知道事态严重。

在健检的当天，紧急送医，输了五大袋血。医生和S说，要不是及时寻求医疗帮助，谢大哥可能在贫血严重的状况下，睡梦中就过世了。目前除了糖尿病，还需要其他的检测，才能知道确切的病因。

他们很感谢社区的帮忙，也希望尽一己之力，帮助更多和他们相似、弱勢的移民工薪家庭。谢大哥说：“很感谢社区人员帮我办的健康卡，还有感谢那些捐血给我的人，从这次我起死回生，让我懂得，我要像平常人开开心心的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

比起炎热的厨房工作，谢大哥更喜欢在超市工作。他擅长在里面的职责，特别有责任心。在疫情期间，其他条件好的同事，可以选择不来上班。但是谢大哥没有这样的选择。即使在健检发现问题，谢大哥也是住院一天后，出院立即回去上班了。

“有时候心情不好，仅剩几小时的休息时间，谢大哥也睡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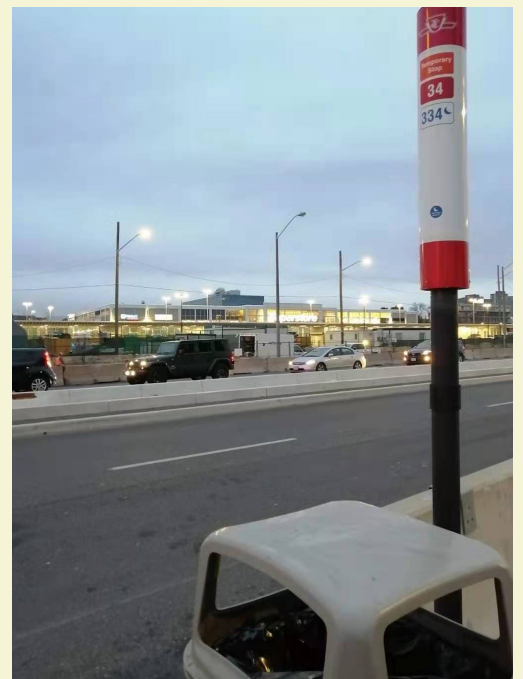


图:谢大哥一周六天上班，每天需要花四个小时通勤



图:负责超市摆货的谢大哥,把所有的商品排的整齐美观

谢大哥对于超市疫情间的安全措施还感到安心。经营一间小店的S希望政府更严格的控制疫情,要到很稳定,再谨慎考虑开放。一定要控制住边境和机场,好好地控制人流。在办公大楼里经营小店三年多的S,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上班,几乎都没生意。即使未来生活回复正常,可能也难以恢复从前。

谢大哥来到加拿大后,一直和亲戚S住在一起。他很喜欢加拿大的生活,空气好,也能自在的加入他喜欢的组织。

即使谢大哥希望能快乐的生活,但是他说目前生活的现状是,

“每天头痛和加上各方面心里的压力...想要像平常人一样买台车....。每天工作劳累和再加上害怕房东赶我走的压力,所以再苦再累想买个房,工作劳累下班后可以安心的休息睡觉。想起儿时听的中文歌: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脸上流着眼泪,只能

自己轻轻擦等等。”

这首歌代表谢大哥的心声,也是他最真诚的愿望。

BB

謝大哥說要是請假,老闆可能就找人補他的位子

99

Copy的故事

Interview and story written with Zichen Xu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yumigou_

Copy 是装修前线工人。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Copy就被工作餐馆的老板欺骗说关店两周，可两周又延后两周。即使無工可做，老闆也不让Copy回餐馆所提供的宿舍裡取回行李。一直拖了半年，看到疫情的结束遥遥无期，老闆才允许Copy拿回宿舍裡的行李。

自此，Copy每天待在家里。刚开始的时候感到比较舒服，因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休息，也可以看一些影视作品消磨时间。但是久而久之，看到餐馆，超市等等行业的失业状况越发严重，心情也感到越发抑郁。

后来，由于对自己财政状况的担忧，也感觉到总是待在家里不是办法，Copy决定去做装修临时工的工作。Copy说，装修临时工总是承担着整个装修环节中，最脏最累的任务。他往往需要去拆除满是灰尘的墙，处理最棘手的装修垃圾，接送工头上下班。甚至连一些必要的防护装备和伙食也需要提前抽出时间自备。

工头时常会用侮辱性的词汇辱骂下属，并用开除来威胁装修小工们。

Copy说道：

“现在餐馆，超市和理发店的人被大量裁减，加上装修行业接触的人少，相对安全，大家都涌到装修行业。那些装修工头特别傲慢，再苦再难的活，钱再少，只要他们一句话，就要去做，要不然他们就骂人，或者威胁换人。为了生活，不想干也得干。有工作总比没有强。”

“举个例子，在我去换瓷砖的时候，需要在地上跪一整天，晚上回家膝盖会红肿淤青流血。每天都感觉自己灰头土脸的，但即使这样，我还被挨骂。而且我们一个月待命30天，真正有工的时候也才4-5天。”

对于这一系列的不公，Copy认为是由于疫情，工作紧缺，而导致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变得越发辛苦。不像疫情以前，工作会稍微轻松一些，工人可以去工作地点附近的餐厅买饭，也能够节省一些在家准备伙食的时间。

但是Copy同时也认为，随着春季的到来，园艺，屋顶等行业的开工，工人们间竞争的略微减少，会使装修工人们艰难的处境有所改善。除了疫情给工作带来的极大压力，Copy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Copy说：

“疫情带来很多不方便，家庭医生，医院，公共交通这些地方绝对不敢去”

“疫情让很多东西都变得非常慢或者做不成，健康卡我也不敢去换，很多正常要做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做”

对于疫情期间生活上遇到的问题，Copy表达了强烈的无力感。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他个人可以去克服的。

“如果有条件，我特别想回中国”

“感觉在这样疫情肆虐的大局下，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就像蝼蚁一样，我们顶多能改变自己的心态，

“那些装修工头特别傲慢，再苦再难的活，钱再少，只要他们一句话，就要去做，要不然他们就骂人，或者威胁换人”

让自己去适应这个疫情，只能等美国的那个辉瑞还有阿斯利康疫苗普及。”

而对于工作上的问题，Copy表示，由于不堪装修师傅的霸凌与剥削，他毅然决然向老板汇报，并提出了辞职。而仍然在职、感同身受的同事们，纷纷站出来为Copy说话。再不久，那位骂人的师傅也被辞退。

对于政府的措施和加拿大整体防疫状况，Copy感到十分失望。他认为加拿大的很多人，普遍做不到像中国一样有效强力的防疫，控制住疫情。



图: 三张Copy在工作中受伤手臂的照片 (摄像者: Copy)

Copy无奈的说道:“最奇葩的是,有一次封城的时候,我开车去拿信,竟然在高速上堵车...高速上到处都是车,堵得跟没有疫情一样。”

Copy认为在加拿大很难透过那些“朝阳大妈”或者“保安”,去减少、限制人们的外出。在加拿大的疫情,只能靠疫苗,且疫苗的接种速度也是极慢。他同时认为,由于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的不同,在疫情的情况下,欧美国家很多人太在乎自己个人所谓的自由,人们的公德心严重缺失,整体情况堪忧。

“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去做装修的时候,有一次跟西人一起工作,发现他们都不戴口罩,而且拥抱握手。”

“我看到他们拥抱握手,躲都来不及,我为了保护自己不感染疫情,全天带着口罩,吃饭什么的都躲着远远的。”

对于政府的防疫措施, Copy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采取类似于中国政府的做法,与其大规模发钱,不如将这些钱用于请义工,让这些义工充当中国“朝阳大妈”的角色,阻拦、限制人们的外出与聚会,并扩大消毒洒水车和直升机的密度和规模。Copy认为如果真的能这样,政府一个月就能搞定疫情。但是同时, Copy也知道这些政策在加拿大

的社会难以施行。对此, Copy深感无奈。

但是无论如何, Copy希望大家,特别是亚裔群体以外的其他群体能提高自己的公德心,减少出门,勤戴口罩,政府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强抗疫力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来疫情结束的曙光。

〇〇

而仍然在职、感同身受的同事们,纷纷站出来为Copy说话。再不久,那位骂人的师傅也被辞退

〇〇

Michael的故事

Jessie Tang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 yumigou_

Michael 为在超市工作的 frontline 工人。

这是Michael在华人超市工作的第九年。与许多工薪家庭相同，Michael全家人的收入都受到疫情而有所影响。在面包铺里工作的爸爸，也因为疫情工时减少。收入减少的状况下，家庭还须支付个人防护器具、口罩、消毒水，等等额外的开销。在养家糊口、物价高涨的压力下，Michael除了继续超市的工作，没有其他太多的选择。

在疫情期间工作对于Michael最大的挑战，是每日工作后的疲累乏力、无奈感。但这样的心情说了也没人同情，只能靠毅力、自我鼓励熬过去。“卫生做好，勤洗手，熬过去！”

Michael觉得在疫情开始之后，也会感觉到别人对身为华裔的他，有着异样的眼光。在超市人流量控管下，他也曾经因为工时的缩短，与部门其他人有些不愉快。后来因为不缺人手，老板要他休息，又不愿意给他失业金证明。Michael说最后他只能自己离职，在疫情间换了

间超市工作。

对于Michael来说，许多工作上的问题不是在疫情之后才出现的。超市这一行工作，待遇低、工时长，是疫情以前就存在长久的问题。没有劳工法保障的工资，例如最低工资、假期钱...等等。他认为政府部门的职员不出来实地考察，不知道人间疾苦，无法理解真实的状况。他说很难想象加拿大还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求的不是牙医保险，而是劳工法保障的假期钱。这些劳工法下的福利，对他来说很遥远。

而很多同事因为没有身份的原故，在工作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例如工作受伤没有保障、没有得到有关假期、加班等等的薪资。Michael觉得这些同事们都在默默工作着、为加拿大社会经济付出心血、纳税，很希望政府能基于人道主义给予他们一个稳定的移民身分。

他以前也曾改过行，做了半年的冷暖，帮忙居家、商店安装电水煤气。刚入行薪资低，扣掉税后难以维持生活方面的开销，后来又决定回超市工作。移民前，觉得美国、加拿大可以赚很多钱。但是移民后，觉得移民的生活总括来说就是讨个饭吃。

对于他这样不讲英文、没有文凭、

技术的移民，他也只能在超市、餐馆或是工厂打打工。这些工作，只要求两只手、两只腿，还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Michael觉得疫情期间政府政策是不错，但是最大受益人还是雇主。这些政策都是把商家放在首位。对于最底层的工人，能吃饱喝足就可以了。他觉得疫情把大家都给闷坏了，压力很大。

随着夏天的到来，Michael很期待和社区的大家，能在公园里见面、办活动，组织活动来团结更多人。

“而很多同事因为没有身份的原故，在工作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例如工作受伤没有保障、没有得到有关假期、加班等等的薪资”

Biying的故事

michelle liu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yumigou_

Biying为餐馆工人。九月份即将入大学念书。

Biying和她的家人四年前从广州移民来多伦多。她在世嘉堡的一间小寿司餐厅做兼职服务员。第三波疫情开始前，她才刚工作差不多一个月。Biying现在19岁，一般一周工作四天，每天五个小时。晚上她去上夜校，同时也在等待秋季进入大学的入学通知。

疫情使得很多在餐饮业工作的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像很多其他工薪阶层的工作一样，餐饮业的工作要求每个人都要认真权衡风险和收入。Biying的工作大部分是处理自取订单，加上餐厅的顾客普遍减少，她就几乎拿不到小费了。然而对她及很多其他餐饮从业人员来说，原本只是拿最低工资（甚至更少），而小费则是除此之外重要的收入来源。但与此同时，Biying也知道在餐厅工作的人变少，也意味着工作场所爆发疫情的风险较低，自己感染新冠的机会也减少，因此感到欣慰。

尽管疫情对Biying自己的生活没有造成不可控的影响，她还是经常担

心自己被感染，再让家人接触到有高传染率和致死率的病毒。工作的餐厅会提供防护器具，而且每一轮班的员工也很少超过两至三人。尽管如此，每天的工作、交通、家居生活和上学还是因疫情而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驾照也没有私家车，Biying主要靠公交车和搭便车上下班。

Biying 在一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上完了高中。像其他在疫情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一样，停课、没能庆祝的生日和微信聊天变成了日常。二月份，多伦多第一波疫情爆发之前，她决定辞掉餐厅的工作，专注于学业。她为自己期待已久的毕业后的生活指定了很多计划。

这一年是高中到大学之间很宝贵的一年。她很期待能够自我审视、获得新的生活经验并且从事自己期望的工作。她计划考个驾照、在夏令营工作并且获得实用的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

疫情对高中及大学生的影响大部分是无形的，而且是无法轻易衡量的。当疫情来袭，Biying没有工作时，政府的救援金（CERB，CESB和CRB）并没有帮助到她和很多像她一样的现金工。然而现金工在很多行业都是很普遍的。救援金原本旨在减少疫情和与之相联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危害。尽管Biying从十一年级中期到十二年级中期都在餐厅打工，但身为现金工，她还是不够资格领取这些救援金。

当被问到政府可以做出什么改变来支持学生，Biying 建议修改安省学生辅助项目OSAP。永久性地拓宽申请资格，并且根据实际的学习和生活开销增加资助金额。正如Biying所说，

“尽管这样能够生存--很多学生找到不同的方法赚钱，不管是兼职、工作-学习项目还是校外工作，例如零售业和餐饮业... 政府如果能给学生更好的帮助，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学习，不是更好吗？”

“疫情對高中及大學生的影響大部分是無形的，而且是無法輕易衡量的”

Biying九月份就要上大学了，她也为此参考了一下朋友的经验。对她的很多朋友来说，他们得到的助学金根本不够用，特别是在像多伦多这样生活费和学费都过高的城市。这种不安又与疫情造成的收入上的损失，和在前线工作却没有足够的支持的压力混合在一起。保证每个人都有基本收入是Biying会支持的一种援助。这也包括学生，帮助学生减轻经济压力，从而专注于学习。

Biying在疫情期间工作和学习的同时，社会上反亚裔的种族歧视也在增加。幸运的是，她自己并没有过这种被歧视的经历，“我觉得自己运气好，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这种事情，身边的人也没有遇到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都保持乐观。虽然最初为不上学的一年所指定的计划无法达成，她也会好好利用这个夏天的时间。

Yuanfeng的故事

故事由Zhang Yuanfeng 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yumigou_

Yuanfeng 为外卖平台司机。

在加拿大做司机的那些年

2018年还是G2的新手司机的我，经朋友介绍，毅然地加入了外卖行业。我作为学生，以及对英语不太自信，外卖行业对于工人要求相对较低。由于我对路况和商家的位置都不太熟悉，在外卖兴起的那年，还是慢悠悠地送餐。这时各种外卖平台带着大量资金争相涌入市场，希望能在市场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径，身边司机朋友月收入竟能达到每日300-350元。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司机来说，每天都能在路上体验着加拿大的波澜壮阔的风景和独特地道的美洲文化（比如独有的小费文化，路上的安全交通规则和意识。），见识并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确实让我更加融入到加拿大的生活。而外卖这份工作的门槛只需要，牌照和一部车和手机。这也确实很多人们中心最看好的新星产业。

随着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各个行业在疫情的冲击下，濒临破碎，更甚至轰然倒塌。外卖行业也在疫情

的冲击，逐渐显现问题。华人送餐平台的顾客大部分为面临高学业、高租金压力、想要便利性的留学生。

疫情导致许多的留学生回国就业，或是留在国内上些网课。除了客户群体减少，多少行业的工人在疫情失去工作之后，也纷纷加入到外卖行业。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活动减免运费做的风风光光，但背地里却以减少司机的收入为代价。

华人外卖平台在自雇和雇佣关系的界线上，完全只顾及自己的利益核心。对于自雇，公司可以不为司机交各种税，汽车保险，退休金，假日补贴和工伤保险。与客户协调方面也尽可能把责任甩给司机们。但司机在自雇的情况下，却需要严格遵守公司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比如准时上下班，吃饭打卡需汇报，穿

“对于自雇，公司可以不為司机交各种税，汽车保险，退休金，假日补贴和工伤保险。与客户协调方面也尽可能把责任甩给司机们”

公司提供的制服，佩戴饭箱和贴公司logo的车贴。

如果出现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会以因司机开车做商业用途为由拒绝保险申诉，並和司机打上一场旷日持久的案件。而没有佩戴好任意一项饭箱，车贴或衣服，经理抓到一次

就罚款50元。

上午忙活半天刚进口袋的钱，可能立马拿给公司了。为了客人的舒适满意度，也为了能在众多的平台之中中脱颖而出，司机被规定一定要在时间内送达餐点。司机们常开玩笑说：“商家出餐由他慢，路上堵车都一样。”出事嘛，公司就是三不原则：不知道，不认识，不清楚。平台会以某种奇怪的理由把责任都推卸到司机身上。

疫情如此严重的今日，司机们不得不全副武装，口罩手套齐全。但无奈面对着饱和的市场，大伙常常只有在吃饭尖峰时刻忙碌，而其他时间没什么外卖单可接。一个小时一单外卖，甚至没有。肚子饿了想要找经理报备去吃饭，也要看目前人手够不够多，毕竟总要留一两个倒霉蛋坚守岗位嘛。好在我们早就和餐厅的师傅们打成一片，常常会给我们加菜加汤。

在马路吃到罚单的概率也比正常司机要高的多，为了与时间赛跑，在公司预定地时间内，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客人手中，送餐员时常超速驾驶。

在客人楼下停久了也要吃罚单的。听在职朋友说，如今忙碌13个小时

的疲劳外送驾驶，一天只有赚得200块。下班赶著回家吃饭，总是觉得，今天又是个超生赶死却又口袋空空的一天。

在每个日日夜夜里，在冬天冰天雪地，马路像溜冰场的世界，在夏日

炎炎，汗流浹背，只为了那几毛油钱而不舍得开空调的日子里。

在病毒肆虐，瘟疫横飞的日子。我们最可爱的外卖小哥捧着您的外卖向您走来。是何种伟大的精神支撑着外卖小哥，在如此高危高强度的环境下工作，缺还要忍受公司的压迫和剥削？如此反复，我想问这两年外卖行业真的就这样走到尽头了吗？



图：在外送的途中，汤汁外漏到袋子里。相片中有两瓶饮料以及食品。(摄像者: Yuanfeng)

66

下班趕著回家吃飯，總是覺得，今天又是個超生趕死却又口袋空空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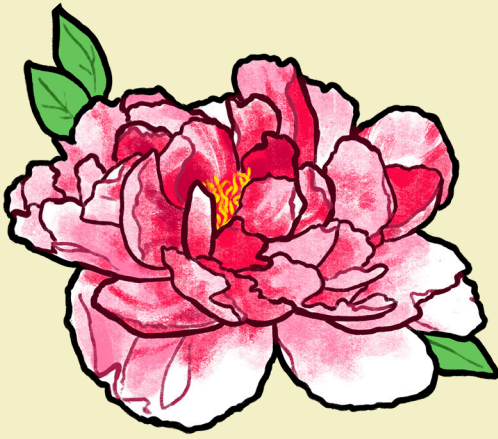
99



图：一个方形的盒子放在乘客座上。当Yuanfeng做外卖时，外送的袋子在乘客座上。(摄像者: Yuanfeng)

Anna的故事

Michelle Liu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yumigou_

Anna为受伤工人，从前在工厂里工作。

Anna 喜爱有关电影的一切。她以前是工厂工人，现在是病人，家人又要在前线全职工作，因此从疫情开始，她就把看电影作为最主要的对付恐惧和焦虑的方法。Anna称看电影是她的终极减压大法。“省下很多看心理治疗师的钱。”她回想起二十多岁在广西生活时，和朋友们一起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无数个夜晚和周末。香港、台湾、荷里活和越南电影--所有能找到的电影，他们都看得乐此不疲。她爷爷是越南华侨，一家三代在越南生活多年的广西人，越南也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直到12岁才离开。

1978年，中越战争暴发的一年前，父亲已因病过世。Anna跟着妈妈，姐姐和弟弟四人在混乱的情况下穿越越南东北边境，希望逃到妈妈老家--中国广西省防城，逃离一场无法控制的危险、暴力和混乱的国际冲突。然而，他们被发配到了广西崇左市的其中一个小镇，在那里，他们是陌生人，没有祖先或家人。这是Anna第一次以难民身份离开家乡。第二次是在香港还是英属殖民地时期。原本，移民香港是在中国的越南人很普遍的移民方式。然而英港府修改入境条例，把这些人定义为非法难民。Anna

也因此再次变成难民。第三次离家，Anna 移民到多伦多定居生活。

电影中的对话、曲折的情节和让人羡慕的浪漫的剧情，让花很多时间吸收它们的Anna轻易地满足了她学习语言的爱好的。越南语是她的母语。是电影、移民和社群教会了她粤语、普通话、一点英语和模糊地想起的壮语。被驱逐出香港后，Anna回到广西，在本地一家麻布工厂做针线活。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另一方面出自个人兴趣，Anna自学成了裁缝并学会制衣。她和朋友们花很长的时间认真地研究、设计和重新制作她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最新款的各种裙子，并且骄傲地穿在身上。

在Anna 20岁左右的时候，她决定离开广西去香港，之后去英国。几年之前，她的叔叔和其他亲戚就已经这么做了，只是没有带上她。为了帮家里还债，Anna 18岁就早出晚归地向一间间水果罐头厂推销自家生产的水果，把这些从自己家分配到的地中种出的水果，批发给它们。两年之后，她就成功地赚取了第一桶金。她想工作、看看世界，并且拥有她离乡的亲戚所描述的更好的经济条件。她把存款的一部分留给了妈妈和姐弟，与朋友一起带着剩下的积蓄向广东省出发，踏上了很多越南移民和难民在越战和文革时曾走过的路。

穿梭于不同国家，特别是重复的找地方安顿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Anna的世界观和她在加拿大的生活。边界是一个既有创伤又有可能是无名的地方。它是无以名状，却又反反复复无形中提醒着人们的一道槛。中国南海的水上边界就

是Anna差点送命的地方。当时她乘船过香港，船上十分拥挤而且混乱。她因此掉了船，差点淹死。现在，Anna说起这段恐怖且让人精神紧张的经历，已经是很平铺直叙了。她记得每天都要为生存而焦虑，以及频繁的晕眩、头痛和长时间的饥饿。这些动荡的经历持续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让她更想有一个家，并且有尽可能多的积蓄。

在那时，越南难民在香港面临严重的歧视，禁闭，以及警方的暴力。Anna在深水埗的越南移民集中营被关押了3个月，之后被转移到屯门。在营中的一年多，她等待官方决定让她去西方国家定居，还是被遣返回广西。由于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之分及，她不能自由出入，不能离开看她想象到的花花世界，也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在香港工作。

Anna 说她在营中没有经历过暴

“确切地说，Anna是一名生病并且带伤的移民工人。她的身體健康被數十年的低收入、超時和不穩定的基本工作而傷害了”

力，而且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包括警察和其他管理人员。在集中营里，Anna定期帮助其他越南移民翻译越南语和粤语，代表他们与警察沟通。同时她也有在营里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在被关押了一年半之后，她被遣返到广西，回到麻布料场工作。

独自再次离开广西之后，Anna来到加拿大投奔跟她在一起五年的男友和他的家人，并结了婚。像Anna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爱情就是不经意地一见钟情。他是在同一间工厂工作的朋友的朋友。这件

工厂是镇上的基础设施，里面有超过2000名几乎都是年轻人的工人，但他们却没有见过面。她在麻布料的生产线上，而他是修理机器的技工。他父母居住加拿大的申请被批准后，他随父母去了加拿大，并承诺会与Anna再续前缘。

一到加拿大，Anna的移民生活就因孤独感和对未来的憧憬而有些复杂。她不认识任何人；亲人朋友也不在身边，并且她也只会一点从荷里活电影中学来的英文。作为一个有语言天分的人，她对自己无法明确表达自己

感到无奈，并且感觉自己因语言障碍而显得无能。她不希望被告知她不能工作。她想要拥有那种与所有她爱的人在一起的温暖。她先生一路都支持

她。她下定决心要想办法让家人来多伦多。Anna需要在学习英语和尽力工作中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只有努力工作，她才能支付担保广西的家人来加拿大的费用。

有两件事情支持着Anna走下去：为将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存钱，以及让家人团聚。两者都与她的迁徙的经历有关。身为难民，存不下钱；要摆脱不安和贫穷的压力；与家人朋友分离以及不确定能在一个地方呆多久。她必须为工作付出劳动，又要花掉几乎所有的时间去工作，这也阻碍着她实现为自己和家人建立起一个家的愿望总是因精力和时间的无法协调而受阻。两者都需要时间，却会顾此失彼。接下来的几十年，Anna和她的丈夫一间工厂接着一间工厂地工作，错开时间做很多轮班。她常年超时工作。有段时间，她一周工作七天，周一至周五在两间工厂做两轮班，每天一共工作十六小时，还要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周末做收银员。她尽可能多地上班。从布料到照明灯具、录像带、地毯、窗户和糕点，她在生产

线上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数以千计地制造将人们的家塞满的东西。

通过临时工仲介找到的工作，是需求量最大却最辛苦的工作。那种工作环境，会对Anna的健康造成影响，理应被视为工伤，却不会被工作安全及保险理事会（WSIB）所承认。Anna最喜欢也最擅长的工作是做录像带生产厂的质检工人。她在那里工作了十年，直到工厂倒闭。这是她与曾经全神贯注地观看的电影和故事的联结。这些都是临时工仲介大规模兴起之前的事了。

自从到了加拿大，看电影这件事对Anna和他丈夫来说，曾经是年轻相爱时最喜欢的事情，也不经常做了。她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是失去了几年学英语的时间。学英语本可以让让她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却因

为要工作而没空学英语。虽然她有时惋惜无法获得的经历和失去的机会，却因自己工作多年而自豪，并对自己拥有安稳的家感到满意。“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说，因为这些年来她成功地担保了五位家庭成员来多伦多，包括她妈妈、姐姐、弟弟和侄子，并且大家都住在她附近。

现在，Anna遭受着晕眩、头痛、哮喘、无力、嗜睡、健忘和一些其他健康问题。有些可能来自漂泊不定时的艰苦经历，另一些则是长期的疲惫、动荡、超时工作和紧张有害的工作条件造成的。在地毯工厂灰尘四起的生产线上，她患上了慢性过敏、哮喘和呼吸道疾病。这使她现在更易感染新冠病毒。当人没有家的安定，必须不停迁徙以求生存，身体所担负的代价就会是惨重的。

虽然对Anna来说，这个代价是生命中的事实，是进退两难时的权衡。即便一开始的困境似乎已经过去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所导致

的人的脆弱，还是可能使人再变得脆弱。去年一月，就在疫情侵袭加拿大前不久，Anna的临时工仲介公司Nuleader突然倒闭了。这使得几百名本来薪水已经很少的拿着最低工资的工人失去了几个星期的工资。当时正在一间烘焙品工厂做签约工人的Anna也是其中一员。现在，她和她的工友们正在努力讨回被拖欠的工资。确切地说，Anna是一名生病并且带伤的移民工人。她的身体健康被数十年的低收入、超时和不稳定的基本工作而伤害了。身为工薪阶层的移民，要生存，不应该遭受职业伤害。然而很多工薪阶层的移民仍在重复经历着多种风险，在身体里埋下了病根。

今年一月，Anna和她丈夫同时在密西沙加的一个肉类加工厂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的二儿子都在那里工作。他们五口之家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他们最大的儿子，本来是餐厅管理人，疫情中是在家工作的摄影师和编辑；以及在工厂工作的小儿子。Anna的丈夫是第一个出现症状的人，恢复期间他在家呆了三个星期。同时工厂也关了门，以控制疫情。Anna去年三月已经停止工作，此时她的症状比丈夫更加严重。四个月之后，她仍遭受着病毒造成的衰弱和延长的后遗症。例如上楼时呼吸困难、肺部乏力和紧张。由于她潜在的病情，家里的每个人都很焦虑和害怕，担心最坏的事情会发生。

幸运的是，在她和丈夫都病得最重的时候，他们的儿子们打点着其他所有的事情。做饭、清洁，并且把饭送到他们分开隔离的房间门口。Anna自己已经不在前线工作了，但她与家人都还是易受感染的。一年多以来，她都努力呆在家里，谨慎且认真地关注公共卫生措施--她完全了解如果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会有什么风险。如此个体化的措施，却没能保护住她。全家有五个人，Anna和她丈夫还有几年才退休，为了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呆在家里不去工作，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他必须去上班，他们的儿子们也是。

现在，Anna最担心的就是生病。

令她安慰的是，丈夫仍在工作。

但是，她每天仍在担心丈夫或儿子会不会携带回病毒回家。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和亲戚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使得他们更能直接地感受到病毒的危險。在疫情期间，因为持续担心可能患上重病和遭受损失，Anna活得步步惊心。与沉重和担忧相伴的，还有悲伤。Anna和丈夫都害怕他们会再次感染新冠病毒，那样的话，会对Anna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每一天，Anna都在想，自己的身体允不允许自己做想做的事情。她的病，现在因得过新冠而更严重了，这让她比以前更容易被感染。今年，几十年来第一次，Anna可以休息下来看电影了。她说，能看电影，是这次疫情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好事，也是愈疗。电影仿佛是一辆车，带她逃离禁闭和病情带来的无趣和恐惧。在好的日子里，她能赶上看电影，能赶上与在美国、英国、澳洲、瑞典、加拿大、中国和越南的朋友互相支持。当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花园中散步。如何再找到工作，是她的另一个压力。

四月底，Anna刚刚打了第一针疫苗。她希望加拿大政府可以迅速且高效地执行疫苗的注射，因为她相信，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包括像她一样有潜在健康问题的工薪阶级。这对她来说，意味着确保每个人都能打上疫苗，无论他们是什么移民身份，并且他们的个人信息应该受到尊重，不被分享给警方。她强调说疫苗计划应该保护每个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处于危險中的人们安全了，那大家就都安全了。“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打到疫苗，那疫苗就没什么用了。”她补充道“如果打疫苗要冒着被驱逐或逮捕的危險，那这些人就不会冒险去打疫苗。保护每个人，也是保护加拿大的一种方法。移民和难民从世界各地来到加拿大。这些人中不仅仅有华人。他们也都需要被照料。”

06

身為工薪階層的移民，要生存，不應該遭受職業傷害。然而很多工薪階層的移民仍在重複經歷著多種風險，在身體裡埋下了病根

09

David的故事

Nikki Huang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全职职位的困难，也还需要更多时间和经验。



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
@yumigou_

David为养老院里兼职的个人护理人员。

我是David，今年61岁，2006年来到加拿大。刚登录的时候在蒙特利尔生活过一段，但是由于不太适应，所以就往返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生活。后来因为考虑的孩子的教育问题，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多伦多生活。

说起我在加拿大的工作经历，我曾经做过配送员，仓库的拣货员，车行的辅助工作人员，工厂流水线的工人。而这些工作想要拿到全职的职位对我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考虑到自己的年纪，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和体力都有所下降，所以想找一个体力可以胜任、稳定的工作。于是在2019年，我59岁时，开始学习个人照顾工作者的课程(PSW)，在培训之后拿到了文凭。

目前从事PSW的工作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但是目前也面临着取得

入行对于我来说也是很有挑战性的，PSW的工作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服务于老人院，这正是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另一种是社区中照顾的工作，需要自行前往病患家中，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后者的工作相对来说可能轻松一些，但是收入也比较低。

即使PSW这种职业比起我过去的工作来说，工作时间比较稳定，可是全职的职位仍是难以申请到，至少需要三年的工作经验。而PSW的薪水在近几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提高，导致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入行。

疫情对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疫情之前，我和很多兼职的同事们都会有会到不同的养老院去工作来保证自己有全职的收入，因为很多养老院只提供兼职的岗位。疫情之后，我们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养老院工作，这对于我们来说很残酷。

就拿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每个礼拜就只能工作两天。从收入方面来说，就减少很多，有时候可能还不如申请政府救济金的朋友们收入的

多。但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还是坚持在一线工作，并没有申请福利。我认为这个福利的政策可能没有太多的考虑到我们的感受。

另一方面，疫情使我的工作选择变得更少。由于我入行的时间比较短，我也想尝试不同的工作环境，但是疫情限制了我的工作流动性，在这个时候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职位有空缺的情况下，我都尽量去工作，来保证我的收入，同时也想帮助到更多的人。尽管如此，我的收入还是不如疫情之前，只能用到平时的积蓄来维持正常的生活。不过幸运的是，我的工作场所的防疫措施做得很好，我的很多同事也都坚持工作。除了工作和维持日常生活，我都尽量不出门，遵守政府的规定，严格实行居家令。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父亲在疫情期间坚持工作，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他们的榜样给他们正面影响。以后当他们走上社会，也可以做一个勤奋诚实的人，这可能是让我在疫情期间坚持工作的精神力量。

希望政府对于part-time工作人员有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很多part-time的职位其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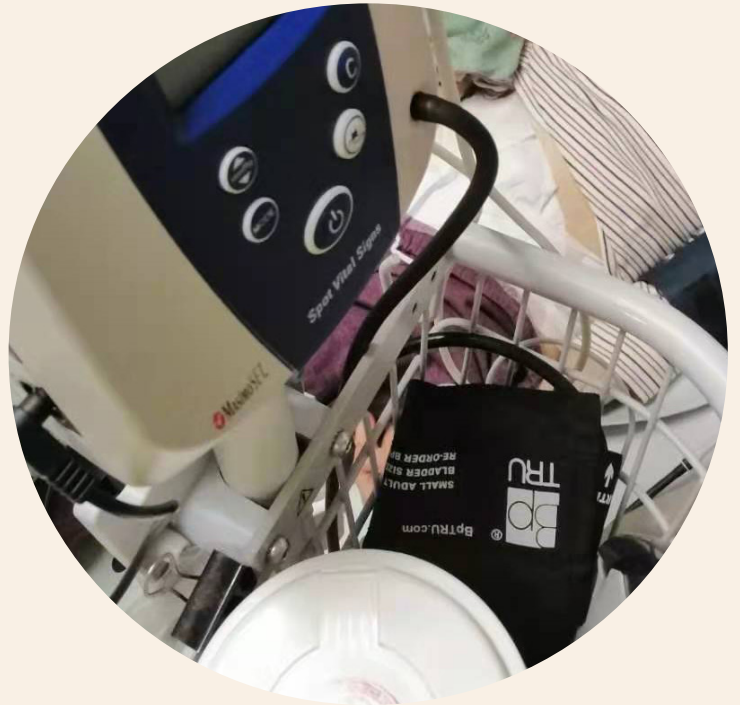
对于整个行业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福利和稳定的收入。

part-time的工作人员没有带薪休假，如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如果政府可以更多的考虑到part time的工作人员的劳动状况，可能会

“尽管如此，我的收入还是不如疫情之前，只能用到平时的积蓄来维持正常的生活”

帮助到很多人。年轻的新移民刚来到加拿大生活需要适应和融入，如果可以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支持，鼓励大家诚实劳动，会让他们更有信心在这里生活下去，对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我觉得平权会可以作为一个社区组织，帮助弱势群体，维护华人权益，可以成为华人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希望将来还能帮助到更多别的族裔群体，我很热爱这个组织。



图：医疗用品以及食物盒(摄像者: David)。

66

希望政府对于part-time工作人员有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很多part-time的职位其实对于整个行业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福利和稳定的收入

99

感谢你们 前线工人



加入我们!

www.ccncutoronto.ca | info@ccncutoronto.ca

WhatsApp/电话: 416-596-0833

微信: Ccncutoronto

Unit 105-1911 Kennedy Road,

Scarborough, ON M1P 2L9